



# 中国 国家图书馆 馆史

1909-2009

李致忠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国家图书馆  
史  
1909-2009

李致忠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李致忠主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13-4070-5

I. 中… II. 李… III. 国家图书馆—历史—中国  
IV. G25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966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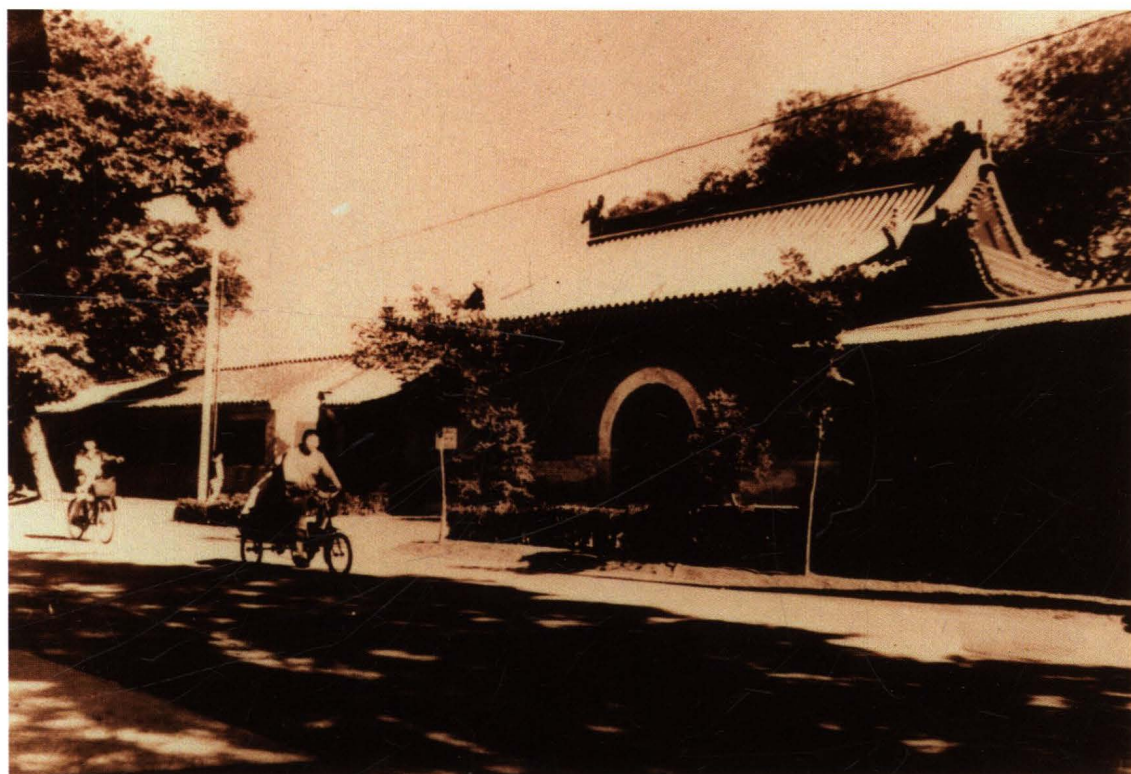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

李致忠 主编

---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5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4070-5  
定 价 精装:168.00元 平装:98.00元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广化寺京师图书馆馆址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上 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在  
方家胡同館址舉行開館儀式  
下 國子監南學京師圖書館館址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上 居仁堂国立北平图书馆大门

下 1929年1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馆址开馆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上 1931年6月25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举行新馆落成典礼

下 文津街国立北平图书馆正门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中关村南大街新馆正面和全景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中关村南大街二期馆舍外景和正面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编纂委员会

主任 詹福瑞

副主任 张雅芳 陈 力 张玉辉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致忠 汪东波 张玉辉 张 彦 张雅芳

陈 力 袁 彪 景鸿达 詹福瑞

##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编写人员

(以章为序)

第一章 张廷银

第二章 赵晓虹

第三章 刘 波

第四章 王致翔

第五章 张燕婴

第六章 程 鹏

第七章 卜书庆

第八章 许京生

第九章 许京生 王 燕

第十章 朱天策

第十一章 朱天策

第十二章 富 平

第十三章 李致忠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分时段记述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发展轨迹的章节体馆史。全书分为十二时段,每个时段各自成章,彼此衔接。第一章自1909年9月至1912年8月,记述清末在西学东渐、图新求变背景下,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初创成立的经过。第二章自1912年8月至1931年6月,记述建馆初期的京师图书馆两易馆名、三迁馆舍,在动荡的环境中艰苦创业的历程。第三章自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记述时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兴建文津街馆舍后全面发展的概况。第四章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记述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播迁、战时服务的史迹。第五章自1945年8月至1949年1月,记述国立北平图书馆光复回迁后维持办馆的情况。第六章自1949年1月至1958年7月,记述人民政府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获得新生的基本情况。第七章自1958年7月至1960年11月,记述下放北京市领导期间北京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概况。第八章自1960年12月至1966年5月,记述回归文化部领导后北京图书馆全面发展的情况。第九章自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记述“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事业遭受挫折,排除干扰,坚持基本业务的情况。第十章自1976年10月至1987年10月,记述“文革”后北京图书馆拨乱反正,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图书馆工作,恢复事业发展的经过。第十一章自1987年10月至2003年12月,记述迁入白石桥新馆的北京图书馆,更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管理机制改革,推动事业快速发展的事迹。第十二章自2004年1月至2009年2月,记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白石桥二期馆舍和国家数字图书馆,跻身世界先进图书馆的情况。第十三章,是总结百年,提取精神,弘扬国图优良传统。全书反映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走过的百年历程,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

# Brief Introduction

This book is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breaks down into twelve periods, each period being described in one chapter. Chapter 1 covers the period from September 1909 to August 1912. This chapt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 predecessor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perme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Chapter 2 describes the hardships 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saw between August 1912 and June 1931, during which the library underwent two renaming and three moving events. Chapter 3 report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from June 1931 to June 1937 after its new site on Wenjin Street was constructed. The fourth chapter covers the period from July 1937 to August 1945 and chronicles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s of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apter 5 reports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from August 1945 to January 1949 after it returned to Peiping. Chapter 6 covers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949 to July 1958 and describes the new birth of Peking Library after the takeover of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Chapter 7 begins in July 1958 and ends in November 1959 and describes the Library's operat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Peking Municipal Authority. Chapter 8 introduc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eking Library from December 1960 to May 1966 after it returned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hapter 9 covers the period from May 1966 to October 1976,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operation of Peking Library under the severe interference of the public movement, and how it overcame the obstacles and managed to keep running at a basic level. Chapter 10 covers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1976 to October 1987.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rders were recovered out of the chaos, and Peking Library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resumed the normal development. Chapter 11 covers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1987 to December 2003, during which Peking Library was moved to the new premises at Baishiqiao and renamed a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rough reforms in the managerial mechanism, the Library develops quickly. Chapter 12 covers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04 to February 2009, when the new century brings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 new site as the Phase II program and 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by this moment, the Library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libraries in the world. The final chapter is a conclusion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r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book not only record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Library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but also reflects the journey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China.

# 序 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典籍大国。《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产生了书籍。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历代典籍浩瀚，这些典籍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体系，记载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维系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迭经天灾战乱摧残，但典籍如汨汨甘泉，始终滋养着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使其焕发着勃勃生机和活力。

在典籍传承中，国家藏书机构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周礼·外史》记载中央专设官员职掌三皇五帝之书和四方之志。传说老子曾担任周王朝的守藏史，这可能是最早有关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记述。从西汉起，历代王朝兴盛时期，都把广搜天下遗书、校雠整理典籍、发布经典正本、编纂大型书籍，作为“文治”之道。但珍贵典籍多藏于金匱石室，虽得自于民，却难为民用。一旦遭遇战乱兵燹，王朝崩溃，多年珍藏往往被摧毁殆尽，发生难以弥补的灾难。

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由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变时诞生的。15世纪中叶，“文明之母”印刷术传到欧洲并广泛应用，书籍数量激增，有力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意味着知识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开始瓦解。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大门，惊醒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图书馆的作用。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都曾吁建图书馆。梁启超《波士顿之图书馆与报馆》一文，认为西方为启迪民智而普遍开办的图书馆，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开辟了没有学年限制的永久课堂。20世纪初，国内兴起创办新型图书馆的浪潮，张之洞、罗振玉在京师，庞鸿书在湖南，徐世昌在东北，袁树勋在山东，宝棻在山西，增韞在浙江，叶尔恺在云南，一些绅士在安徽，都倡议建立公藏图书馆。

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张之洞《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关于调拨文津阁《四库全书》并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书籍，在德胜门内净业湖南北修建图书馆的建议，标志着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正式筹建。1916年，教育部飭京师图书馆，凡在内务部登记的出版图书均交一份入京师图书馆度藏，从而开启了京师图书馆接受图书缴送的历史，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开始体现。

早在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就指出：“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1909年《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中更是明确规定，“京师图书馆业经臣部奏明开办，各省图书馆亦须依限于宣统二年一律设立”，并规划了二十条通行章程，明确图书馆的宗旨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从此，大型公藏图书馆在中国正式诞生。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的一个标志。而先期建立的京师图书馆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国立图书馆，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百年来，国家图书馆的荣辱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动荡，馆址屡经变动，藏品灾损堪虞。馆舍先从什刹海广化寺迁方家胡同前国子监南学，又迁中南海居仁堂。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合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为一体，仍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名。1931年，文津街新厦落成，建筑采用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形式仿中国宫殿之旧貌，书库可容书50万册，阅览室可容200余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图书馆。但就在开馆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起，国立北平图书馆被迫将部分珍贵馆藏南运上海等地避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国立北平图书馆沦入日伪之手。日本文化特务机构兴亚院所属宪兵闯入馆中，拿走全部钥匙，接管图书馆。国难之痛，至此尤显。1945年光复后，又经历三年内战，直到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图书馆才回到人民手中，结束了40年多灾多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在原地扩建书库，并先后新建三栋附属楼，总面积3.4万平方米。由于馆藏增长迅速，政府先后拨借故宫神武门城楼、故宫西路寿安宫、柏林寺等地储存图书，暂解藏书燃眉之急。1973年10月29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另选址建立新馆。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听取馆长刘季平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汇报，6月1日发出《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指出北京图书馆新馆“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请万里同志抓这件事”。1983年9月23日，新馆在风景秀丽的紫竹院公园长河北岸破土动工。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为北京图书馆题写馆名。1987年7月25日新馆落成，10月开馆接待读者。新馆建成后，北京图书馆馆舍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在当时世界上排名第四位。1998年12月12日，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江泽民同志题写馆名。2008年6月，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竣工，9月9日开馆。目前，国家图书馆总面积达25万多平方米，成为亚洲第一大图书馆，位列世界第三，为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图藏书主要是靠国家拨交、藏书家捐赠、馆员努力购求和出版单位缴送。京师图书馆建立之初，政府即调拨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和国子监南学藏书，以及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等珍贵文献。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由八路军抢救并保护下来的全部《赵城金藏》由河北涉县运至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人民政府正式拨交的文献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大了对北京图书馆的支持力度。郑振铎和王冶秋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制定文物抢救法规，从废纸厂抢救回大量珍贵文献，将各地文保单位藏书调拨北图。1955年和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两度从香港购藏陈清华旧藏珍籍 102

种；2004年，又实现了第三批陈清华海外遗珍的回归。通过中央政府协调，还实现了《永乐大典》等珍籍从前苏联、前民主德国的回归。在国家图书馆发展史上，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有众多有识之士为国家文化事业努力拼搏。社会各界支持国家文化事业的无私无偿捐赠延续至今，如傅增湘捐献了双鉴楼藏书的精华；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捐赠了21册《永乐大典》；周叔弢无偿捐赠了400多部宋元善本；郑振铎一生收藏的10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许广平捐赠了鲁迅的全部书稿；郭沫若、巴金、傅雷、吴晗等也捐献了自己的手稿。梁启超担任馆长的北京图书馆，首创寄存制度，号召社会贤达、藏书家将书籍寄存图书馆，为民众所共享，他身体力行，遗嘱将自己的藏书永久寄存在馆里。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家人又捐赠了家藏的大量书稿和金石碑帖。国家图书馆员工也不遗余力地努力采访各类文献，古籍善本、名家手稿、新善本、外文善本、金石拓本、舆地图、少数民族语文古籍、地方志和家谱、民国文献、博硕士论文等都形成了特色专藏。国家图书馆所享有的缴送制度，数十年来有效提高了馆藏数量。在国家图书馆，前40年积累藏书总量不过140万册（件），而到2008年底，藏书总量已达到2700万册（件），跻身世界第五位。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国家图书馆还积累了超过250TB的数字文献，其中自建资源达到120TB。

国家图书馆先后有缪荃孙、江瀚、夏曾佑、马叙伦、陈垣、梁启超、蔡元培、袁同礼、冯仲云、丁西林、刘季平、任继愈等知名学者和行政领导相继出任馆长，他们不仅在事业上各有建树，还团结了一批社会贤达共襄馆务，并且由他们培养或任用了一批又一批的图书馆人才。向达、王重民、刘国钧、严文郁、孙楷第、谢国桢、贺昌群、王庸、汪长炳、李芳馥、谭其骧、赵万里、杨殿珣、张秀民等等，都是从国家图书馆成长起来的知名学者。还有一代代默默奉献的普通员工，他们立志岗位成才，恪尽职责，甘为人梯，爱岗敬业，求实创新，支撑起国家图书馆这座知识大厦，也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国图文脉。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图书馆大胆开拓，锐意改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承担着送书下乡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数字图书



馆工程等多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史明志，鉴往知今。在国家图书馆百年诞辰之际，这本馆史的出版，使我们回顾其百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历史责任，理清工作思路，确定发展方向；激励我们以更加超前的理念、更加先进的技术、更加刻苦的精神、更加扎实的作风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推动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化部副部长 周和平

2009年8月3日